

开学季·上课记

9月开学季。小学生踏入校园,身后是成年人的惶惑不安;而大学生,作为更为独立的个体,这一次踏入一个校门之后,有更多自我选择的意味。

“我不相信知识必定改变命运,但是,探求知识,经历世事,放开眼界,绝对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,而中国的大学和大学前教育的最大区别,恰恰在于,是做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还是主动的身体力行的探究者。”

写出《上课记》的王小妮,从教师与旁观者的角度,给出一种前行的引导。

而纵观百年来的高等教育,无数初入大学课堂的年轻人,最终,仍旧以自我的方式,去拨开身陷的迷茫。

那么,2017年的开学季,你准备好了吗?

一本《上课记》,有王小妮的期望 年轻人应该从中看清自己的困扰并学会—— 自己判断,自己解决,自己长大

本报记者 孙雯

9月23日,第一次课。我看看教室下面这些眼睛。

……

现在,这些就要接受所谓高等教育的孩子们,眼睛里重新透出10岁似的,什么都不知道的光芒。我该给他们什么,才能心安,才对得起这满含着水分的注视。

这是《上课记》的开头。

这几天,微信朋友圈里,又流转起诸多《上课记》的片段,写出《上课记》的王小妮被形容为“奇怪的老师”——她要在学生的写作中消灭毫无意义的好词好句、“最好的老师”——她一直在追问自己该如何不负讲台灼灼的眼神。

其实,这仅仅是王小妮教学中的日常,她又以最朴白的方式,记录下这些日常。

于是,从2012年起,有了《上课记》、《上课记2》,以及由东方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《上课记》。

新版增加的部分是“我们来自‘上课记’”:王小妮教过七届大学生,她手里的花名册上有1000个名字,其中的19个人,在2016年7月写了他们大学毕业后感受最为深切的生活。

《上课记》一直在呈现着王小妮与学生的互动,包括课堂内外,也包括书中的文本样式。这一次,“互动”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更为广阔的延伸。

王小妮用那些一掠而过的细节,记录下一个时代和一群年轻人。

而教育该是什么模样?师生该有哪些共同秉承的判断?王小妮与她的《上课记》,给出了一种回答。

【土地与人】

“你的出生地不丢人,它永远都是你的来路和宝藏”

钱江晚报:在《上课记》中,您时常和学生谈及“土地与人”的关系。虽然,您的学生有一大部分来自农村,但90后农村学子与土地的接触已经非常少,而且,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城镇。为什么会重视让这一代学生去审视土地与人的关系?这种关系的梳理,对于他们的成长有怎样的意味?

王小妮:在1998年到1999年间,我有机会分别去了重庆巫山、贵州织金、陕西延安和佳县,认识了一些去贫困山区支教的城市青年、在乡村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,写了《巫山的背后》、《巫山行》和《陕黔记》,几万字,都是记录性文字,收在了《中国腹地行》这本书里,那时候还没“非虚构”这个概念。

从那时候起,我对于乡村出来的学生的关注已经开始了,在高校里常爱问学生从哪儿考来的?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?真的遇到了从贵州毕节地区、从重庆僻远山区来的同

学,简单算一下,他们几乎就是几年前我在这些贫困山区遇见的留着鼻涕的小学生。

我也遇到了从东北山区来的学生,而上世纪70年代,我恰恰是一个在那个寒冷地方插队的知青,对那段生活,也有写过长篇小说《方圆四十里》,我知道北方农民几月播种几月收割,知道土地的艰辛。

这种奇妙的联系,不是哪一个具体地域,而是形成了整个的对土地和人的关系的认同感。

现在,即使是来自乡下的学生,从来没离开过小镇,也不太懂得土地,因为他们得一直读书,一直啃书本,一直被父母家人告知,只有离开土地才可能有前途。对于乡土,他们更多的认识是一走了之或不愿提起,我可以提醒他们,你的出生地不丢人,它永远都是你的来路和宝藏。

而城市长大的孩子,也有必要了解我们这个刚刚要走出农耕文明的族群特征。

钱报:大学聚集了四面八方的年轻人,《上课记》中也涉及到诸多有关故乡的话题。在您看来,故乡对这些远离的年轻人,意味着什么?

王小妮:家乡是背景,大多数人都很难再回去了,这既是乡村几代人的愿望,也是严酷的现实。

如果他们拿不定主意来问我,我会建议他们去大地方,看看世界,别被小地方给框住了。也有同学回到家乡,只要是他们决定了的,我会支持。

曾经遇到一个回到自己读书的小学做乡村教师的大学毕业生,我很好奇:站在自己读书时候的教室讲台上,这位置变换的感觉。不过后来,这个在距离武汉不太远的乡下教书的女老师去了上海,决定走之前,家人非常不理解:为什么好好的铁饭碗不要了?很久没她的消息了,感觉她的境遇好一点会跟我说的。

【存在感】

“更多的孩子不肯做父母手中的棋子,中国式父母也更容易被伤害”

钱报:最新一版的《上课记》,收进了很多学生踏入社会之后的近况与感想。除了他们作为个体在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变化,对于这一代人,您从他们的文字中,读出了什么?

王小妮:他们的态度比上学时候应付来自老师的“作业”主动多了。文字变得扎实淳朴了,读书时候,写什么是要交差,完成就万事大吉,现在是扎扎实实的个人的生存现状。

他们有点急着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,读书读了十几年,最后终于进入他们不适应不知所措的现实中,这个适应调整的过程,三年两年是不够用的,可青春短得很,所以,他们最常发出的感慨是:老了!

钱报:19位“来自《上课记》”的同学,文



王小妮

1955年生于长春市。诗人、作家。

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任教。

作品包括《1966年》、《月光》、《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》、《世界何以辽阔》、《方圆四十里》、《上课记》等。

字之间,可见他们中一些人仍有当下的迷茫,但多了自主的选择和决定。

王小妮:他们终于开始体会到了自己的存在感了。过去十几年里的选择决定,几乎全是靠老师靠家长在,到了大学毕业,忽然有被抛向、被甩到社会上无依无靠的感觉。没有人再能替代他们去选择和决定了,更多的是家长的能力有限了,少数能力强的家长照样毫不松懈地继续帮他们做决定做安排——这是普通农家做不到的。

得说说传统的报效和尽孝的思维,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的观念还相当顽固,特别是小地方的女生,毕业了,家人卖力帮她安排一份小镇上的稳定工作,几乎马上就要盼着你结婚,而这之前的十几年,又恨不能时刻都在叮嘱着读书时候不能恋爱。这前后反差太悬殊了。

也有家长能理解他们,由他们选择自己的路,我其实是懂得他们的那种不敢即兴表达的中国式父母的焦虑。

更多的孩子不肯做父母手中的棋子,但逆向思维也让他们不知不觉中伤害了父母,而中国式父母也更加容易被伤害。

钱报:《上课记2》中,您曾写道,“好无助”(一位自称“好无助”的学生)的电话号码,还安静地在手机的通讯录里。那些可能仅联系过一次的学生手机号码,那些已经出现或者没有出现在《上课记》中的短信与邮件,您一直都保留着吗?想到或者再读到它们,有怎样的心情?

王小妮:不教书以后,我就换了智能手机,上课时一直用最便宜的诺基亚。好多电话号码、好玩的短信息,都保留在那个旧手机里,不过,他们毕业离开后,电话号码都会变的。将来,那部手机就很珍贵了。

一直都没有重读它们,包括几大包学生作业,它们跟着我从海南回到深圳,在角落里安静地待着,没舍得丢掉,不过也没有去看,看起来太沉重,那种氛围和气息都会回来。



对话全本,请下载浙江24小时App阅读。